

二大爷讲故事

□ 贾春国

四十多年前在我童年的时候，最爱听二大爷讲故事，听他讲故事是一种享受。

仲夏之夜，圆圆的月亮刚爬上树梢，二大爷便拿着蒲团来到沿街门口歪脖子老槐树下，蒲团往地下随手一放，各家门口乘凉的和捉迷藏的孩子们都围拢过来，准备听二大爷讲故事。那时，村里还没有电灯，流风的村街上不像现在这么多车，是纳凉的好去处。加上月色很好，大家兴致特别高。于是，在孩子们的催促下，二大爷便坐在蒲团上，摇着蒲扇，神态岸然地开讲了。

这晚上二大爷讲的是《佟大人鬼断家私》，说的是古时候，有一位佟大人年老辞官回家，因难耐晚景凄凉，遂又续了一房姨太太，这位姨太太给他生育了一位小公子，之后不久佟大人就去世了。临终前，佟大人把最好的房子和田产都分给了前妻生的大儿子，只给了小儿子和他母亲一些破屋薄地，另外还给了他母子一幅画，嘱咐她娘俩一定藏好这幅画，等到县里来了清官大老爷就把画交上去，说完就咽了气。佟大人死后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忍受着大儿子的白眼和虐待，过着贫寒凄苦的日子。终于有一天，听说来了一位清官大老爷，佟大人的姨太太忽然想起那幅画和佟大人的临终嘱咐，就带着儿子到了县衙，向知县老爷哭诉了家产分配不公和这些年的遭遇，并把那幅画交给了县老爷。画上面的是一位老者一手怀抱婴儿，一手指着地下，知县经过冥思苦想，终于破解了这幅的秘密：原来佟大人临终留下的这幅画是一幅藏宝图，金银财宝就埋在这母子二人居住的破屋的地下。从此娘俩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

二大爷讲故事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，就是在坡里干活的时候，大人们累了在田间地头歇息，也都要求二大爷来一段。他虽然也累，如果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，于是就拣那些短小精悍的故事来讲，讲完大家哈哈大笑，顿时忘记疲劳，感觉轻松了不少。

如今，二大爷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，这些发生在儿时的事，对启发我的文学想象力是大有裨益的。在我没有看“三言二拍”和《三国演义》前，这于我都是很早也是极珍贵的启蒙，以至于后来我学习语文或给孩子们讲故事，都颇受二大爷的影响。

一提起我的童年，二大爷讲故事时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。

了黄的古书。我经常见到的是二大爷坐在一张小板凳上，手里撮着一本竖版繁体字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因不知看过多少遍了，泛黄的书页都卷了角儿，书脊都用线缝过多少遍了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丰编三绝”的线装古书了。二大爷先天弱视，可能是舍不得花钱配镜子，就一直这么看书。因为远了看不清楚，二大爷看书时眼睛离书上的字很近很近，这时鼻子往往就碰到书上了。街坊邻居来串门碰巧遇见，就开玩笑说二大爷看书不用眼用，用鼻子闻闻就知道书上的啥了。

其实二大爷经常讲的故事还是《三国演义》，每当开讲，感觉二大爷是当真实的历史给大家讲，非常投入，且很有些出神入化。我印象中他讲的最多的是赤壁之战里的精彩情节，为了让大家听得高兴，有时他也穿插一些自己虚构的细节。听故事的人里，如果有谁看过或听过《三国演义》，就说“二大爷你那里讲错了，书里不是这么写的”。二大爷就停止讲故事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演义是那么写的，可是《三国志》却不是那样的！你看过《三国志》吗？那里面记载的都是真实的！”对方便无语了。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二大爷看《三国志》，也没见他屋里有这么本书，大概是二大爷急中生智搪塞那个挑错儿的人吧。

二大爷讲故事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，就是在坡里干活的时候，大人们累了在田间地头歇息，也都要求二大爷来一段。他虽然也累，如果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，于是就拣那些短小精悍的故事来讲，讲完大家哈哈大笑，顿时忘记疲劳，感觉轻松了不少。

如今，二大爷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，这些发生在儿时的事，对启发我的文学想象力是大有裨益的。在我没有看“三言二拍”和《三国演义》前，这于我都是很早也是极珍贵的启蒙，以至于后来我学习语文或给孩子们讲故事，都颇受二大爷的影响。

一提起我的童年，二大爷讲故事时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。

奶奶的矿山情

□ 王俊

十八岁那年，奶奶嫁给了比她大三岁的矿工丈夫，此后至亲中同辈、子侄辈、孙辈有近二十人先后到矿区工作。她的弟弟因为矽肺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，她的一个侄子更是在青壮年便被一次煤矿事故夺去了生命。

“生活苦涩有三分，她却吃了十分”，这用在奶奶身上一点也不为过。她八岁丧母，十六岁丧父，自幼便承担起了抚育弟、侄的重担。婚后她生育了两儿两女，还有叔公需要照料，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为了一家人能活下来，“小脚”奶奶日夜操劳，挖野菜、扒树皮、拾柴火、洗衣做饭。“你奶奶都是夜里三四点就起来推磨、摊煎饼，很多时候摊上两个小时筛子上还一个煎饼也见不到，家里人多，灶子里没油水，饭量都特别大。”父亲经常讲这样的故事给我们听，而奶奶自己却经常吃不饱甚至吃不上饭，为此落下了病根。奶奶50多岁便已基本耳聋，颈椎病痛更是伴随她终生。

生活的艰辛使奶奶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。剩下的饭菜，奶奶总是热再吃，菜汤兑上点水全部喝掉。在路上遇到玉米粒、豆粒，尽管行动不便，奶奶还是弯下腰捡起来。

生活的艰辛还使奶奶养成了整洁的好习惯。房内房外，奶奶一直收拾得板板正正、利利索索。尽管病情很严重，除夕晚上奶奶还是坚持自己换上了新床单。去世前几分钟，奶奶坚持自己下床上了最后一次厕所，干干净净地离开，不给予女添半点麻烦。

爷爷在煤矿工作的30余年里，奶奶独自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担，对待叔公，虽不是至亲，奶奶却如亲父一般对待，四十年如一日，悉心赡养。爷爷不管上早班还是上夜班，奶奶再苦再累，都精心伺候好饭菜，并时时叮嘱爷爷注意安全。

奶奶后来又把十多个子侄、孙辈送进矿山。旧社会煤矿安全没有保障

父亲的家书

□ 柯云路

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发现数封大伯的信件。每封家书，大伯都以“亲爱的锦祥胞弟”开头。父亲是极为细心的人，重要信件常会先打草稿，有些草稿会随回信一起存留，这就使得父亲自己的文字也保留下一些，“敬爱的尔文胞哥”，是父亲对大伯一以贯之的尊称。

父亲生长在上海浦东一个热闹的大家庭，奶奶一辈子生育过六男六女，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。十二个子女存活下来八个，大伯和父亲是仅存的两个男孩，自然备受呵护。大伯年长父亲五岁，让长子成才那是那个年代整个家族的梦想。在乡下务农的爷爷奶奶勉力培养大伯读至大学毕业，相当不易。待大伯能在社会立足，父亲的读书费用便全由大伯负担。可惜由于战乱，父亲未能读完大学就被迫辍学。

大伯并未辜负长辈期待，成为颇有成就的建筑设计师，在2003年致父亲的家书中，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人生观：“在基点之上人分三类，一般努力，比较努力，很努力。”大伯显然把自己归于“很努力”的那种。他说：“我自幼树立正确人生观，在每个环节上都是努力争取做得完胜，这是能在一生工作上基本成功的所在。”大伯本名锦堂，大学毕业后考取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建筑师事务所并出国工

作，在国外时为交往方便，改名尔文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大伯“思念家人父母，毅然回国”(大伯家书)。解放后进入华东设计院直到退休。他的“最后两个设计作品是苏州南林宾馆和上海南京路海仑宾馆，都得到了好评”(大伯家书)。

父亲早期跟随大伯工作经历，在日记中用“恩情难忘，终身铭记”八个字形容胞兄的照顾和培养。建国初期，父亲开始独自一人到北京工作，不久在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中受人诬陷被打成“老虎”，关押在一处荒弃的校园，日夜审讯，强令交待“贪污罪行”。一夜，刚刚结束审讯，忽又从床上提起，一队“老虎”被人用绳子捆好押到室外，在漆黑夜色中游走，说是要上“刑场”。惊慌的一队人被牵着转了近两个小时，魂飞魄散之后再被押回。年轻的父亲此前一直在大伯的羽翼保护下，如此险恶何曾遭遇？消息传到上海家中，母亲正带着年幼的子女，急切中跑到大伯那里讨主意。大伯二话不说，当即让大伯母将她的金银首饰全数拿出，说教弟弟要紧，有天大的事等人出来再说。

母亲将我们托付给爷爷奶奶，独自怀揣着自家房契和大伯母的金银首饰到了北京，用这些东西换回了父亲的自由。清白的父亲自然不服，反复申诉后事情

终于查清，确是有人诬告，真正的“老虎”被绳之以法，房契及大伯母的金银首饰被原样退还。这似乎是个喜剧的结尾，却给父亲的精神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。父亲生前多次忆起这段经历，感念大伯无私的救助，晚年更常常怀念儿时与大伯相处的快乐时光。

2008年春，那时母亲已去世一年，大伯在信中平静地谈到了生死，他说：“人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，过去到现在正在眼前，未知以后如何难测，百岁的人总是少数。”这是大伯给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书，而父亲在回信中则对大伯说：“感慨归感慨，还望多保重。”

2009年春，多年一直在京的父亲无法排遣对上海亲人的思念，不顾子女的强烈反对，坚决要去探亲。其实大伯已90开外的高龄，身患多种疾病；而父亲几年来也多次住进医院，所谓“风烛残年”。父亲到达上海的时候，大伯正住在医院，耳朵全聋，听不到任何声音，而父亲也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勉强听得到一两句话。当年那个处处呵护胞弟的大哥无力地躺在病床上，耄耋之年的兄弟俩没有任何言语，只是相对微笑，用点头和目光表达着彼此的情意。对于这次见面，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“此次去上海探亲，自己尚可缓步走路，但时常鼻子过敏流涕。遗憾

的是尔文大哥身体不佳，七种病缠身，在5月10日那天，我差不多半天多给大哥按摩，手、足、腹、面孔等，强作笑脸。临分手时，忍不住悲哭而别！”

这就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。晚年的父亲每逢春节前都会给大伯一家写信问候，并寄一点钱表达心意。他的这些信件也不少留有底稿。他记下的最后一笔汇款在2012年1月，就在这个月份，他所尊敬的大嫂去世，不到一个月后，“敬爱的尔文胞兄”也撒手人寰。因父亲那时已极度虚弱，怕他伤心过度，只将大伯母去世的消息告知，也就是说，父亲生前并不知“敬爱的胞兄”已先他离去，还常以敬爱的胞兄尚高寿在世引为自慰。

父亲是与大伯同一年离世的，直到最后都对大伯怀着深深的眷恋。日记中有不少地方记述他对大伯的牵挂，他“常在梦中与之相会，醒来后辗转反侧，再难入眠”。

血浓于水，这就是同胞手足之情，恐怕是当代的独生子女们很难体会的。而在互联网时代，电话、视频、微信等早已取代了家书，即使是亲人间的联络也不用那些贴着邮票的信件了。但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于我而言，父辈这些手写的家书弥足珍贵，我会永久保存。

怀念与感伤

□ 张期鸣

今年是吴伯箫先生诞辰110周年，作为我的同乡前辈，他是莱芜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。

他的寿命不算很长，只活了76岁；作品也不是太多，大概只有200多篇。他的以《记一辆纺车》为代表的系列回忆延安战斗生活的散文，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“延安精神的歌者”。这样一个人自然是应该纪念的。

我的老师张欣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写成《吴伯箫年谱》，即将付梓；吴伯箫先生的骨灰撒放地泰安，在他逝世30周年之际曾建立了吴伯箫纪念馆，置立了吴伯箫塑像，今年又将置立吴伯箫纪念铜像；莱芜市委宣传部、市文联不仅要举办一系列座谈研讨活动，还准备设立“吴伯箫散文奖”。其中最使我感动的，是我的朋友、莱芜民间收藏家张爱勇兄。前段时间他告诉我，他竟然花了5000多元，从网上买下了吴伯箫先生的两纸信札。

我知道，张爱勇兄的收藏是以书画为主的，这类藏品他以前并未关注。那天我们见面聊天，我谈起其中缘由，他说：“我看了你的《吴伯箫书影录》、《王毓铨书影录》、《吕剑书影录》之后，感觉这三位莱芜现代文化名人的东西需要抢救性地搜集一点。今天不赶快做，恐怕今后想做都来不及了。”于是，他按照我书中提供的线索，遍寻“莱芜现代三贤”的著作版本，现在已经搜集了不少。然后，又旁及他们的书信、手稿、资料。他甚至还想收藏一些他们生前的藏书、藏品和笔墨纸砚之类，留给后人，传之后世。

那一天，我坐在茶桌旁，静静地听他

讲，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之感。好像他是一个天外来客，在谈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美好但又过于遥远的事情。因为这类收藏是全心全力的付出，靠的是一种真挚、纯净的情感，一种对故土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，感动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，我很想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与他热情拥抱。但我没有那样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静静地听他讲。我十分享受这种静静的氛围，仿佛荡尽了人间的烟火之气，有一种超然出世的感觉。

那一天，张爱勇兄还送我一本吴伯箫最早的散文集《羽书》，是194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初版本，距今已有75年的历史。他说：“我从你的《吴伯箫书影录》中，知道你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。收入《吴伯箫书影录》的，是1982年花城出版社的再版本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有两本在拍卖，就一块买下来了。”我问他价格，他笑而不答。我知道，这份沉甸甸的情感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

这本书的确是我苦寻不得的。几年前，我在撰写《吴伯箫书影录》时，多想找到这本书啊，因为这是吴伯箫出版的第一本著作。我当时认为，因为年代久远，这个初版本恐怕已经很难见到了。现在，它竟这样不期然而然地摆在了我的眼前！这本纸页已经发黄、变脆的小册子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经历了哪些曲折，凝聚了多少故事，我一时还不得而知。只知道，因为战乱和“文革”，这本书吴伯箫本人也没有见过。他手头的一本桂林再版本，也在“文革”的“打、砸、抢”中被人“抄”走了。这又

是一种怎样的酸楚和伤痛呢？有时候，一本书的命运真的比一个人的命运还要曲折、复杂，而今，张爱勇兄又使它重现于我们这些晚生晚辈面前，并使它以这种方式回到了家乡莱芜，功莫大焉。

正如春风来，还会有倒春寒一样，就在这样一个时刻，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在风中传播，令人伤感。我听说，位于莱芜城里的吴伯箫故居要拆掉。也有人说，不是拆掉，而是迁建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但迁建之后，还是吴伯箫故居吗？对现在先进的建筑技术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大楼都可以平移，古建筑都可以恢复，几间年久失修的破平房拆到别的地方另建起来，有何难哉？可是，这座老屋实在不同于一般的老屋啊，老屋下这方小小的土地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，这里孕育过一代著名散文家、教育家，这里是吴伯箫人生的出发点，是他的精神和灵魂之根。一个人人生的出发点可以重新选择吗？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之根可以随便拔起吗？更何况，这样的名人故居，在莱芜，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莱芜土地上，已经是唯一的一处了。

这个令人心寒的消息，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被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钟楼，那是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伤痕，是一代甚至几代人惨痛的记忆，也应该是一些人难言的耻辱与悔恨吧。拥有众多名胜古迹、名人故居的济南尚且如此，只有残存的一处名人故居的莱芜，是否应该深思和警醒呢？当然，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。祝愿这个消息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传闻，很快就会被春风吹走。

我的姥爷

□ 徐军祥

人们常说隔辈亲，只有当了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后才会有切身的感受。今年已经3岁的孙机灵真可爱，小家伙时常拉着长音一声声喊叫着“姥爷……”，给人难以言尽的快乐，而我更是对他疼爱有加。几年来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在回味与小儿孙嬉闹的情景后，就自然想起我的姥爷。

姥爷名叫王中训，生于1909年，1979年2月27日(农历腊月二十九)去世。姥爷在人间70年，正赶上动荡苦难年代，吃尽了人间酸苦，几乎没有享过一天福。让我一生都忘不了的是姥爷是被一张破席捲卷着下葬的，赤条条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听我的母亲讲，姥爷的父亲兄弟二人，老大谋生去了河北省张家口，育有一子二女，解放前后期间曾回过家乡，村里人都叫他“口外客”。老二，即姥爷的父亲育有七子两女，我姥爷排行老五。说起我的七个姥爷的命运，真让人感慨万分。大姥爷，二十几岁就因缺医少药而病故。二姥爷育有一子一女，50岁病逝，其儿子在1941年12月22日于广饶小码头惨案中被日寇活活烧死，女儿嫁人后不久就病死。三姥爷，四姥爷都被日本鬼子打死。参加八路军的六姥爷在与日本鬼子激战中光荣牺牲，七姥爷在那次小码头惨案中勇敢地踢倒对他行凶的鬼子，迅猛躲过后面飞射来的子弹跳入淄河，幸运地逃过一劫。当天晚上，家里人哭天喊地认领一

尸首下葬后，第二天他却奇迹般地回来了。七姥爷育有一女，在兄弟七人中活得最长，但他年轻时就因眼疾双目失明，一生几乎是在黑暗中度过。

我的姥爷一生有过两次婚姻。第一次婚姻，生了四个女儿都很快夭折了，媳妇年纪轻轻就撒手而去。第二次婚姻娶的是邻村的徐姓姑娘，即我的姥姥。姥姥先后生了五个孩子，四十二岁那年因病撒手人寰，当时我母亲十四岁，最小的舅舅才两岁。从此，姥爷又当爹又当娘，硬是把这个残破的家撑下来。早上，姥爷用锄头挑着一瓦罐水和窝头咸菜下地干活，晚上进门就帮我母亲烧火做饭，深夜还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，农闲时就给地主家打短工。在那无尽头的苦日子里，很难想象姥爷他受了多少罪，经历了多少人间辛酸。

姥爷没有多少文化，一生都没有走出他那偏僻的家乡，但他心地善良，明白事理，一生几乎没有跟人红过脸，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。

我从小跟着姥爷长大。儿时的记忆里，我经常跟着母亲去看望姥爷，从我家到姥爷的村庄大约是四里地，沿着老淄河南岸徒步半个小时就会到姥爷家。从2岁开始，母亲就经常把我送到姥爷身边，一年当中总要住上几个月，一直到邻近上小学。天下当姥爷的没有不疼爱外孙的，但就我姥爷来说，天天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做飯洗衣很不容易，因为在我们

